

發見的歷史和隱去的歷史

——評《上海道台研究》

● 張光潤

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繫人物，1843-1890》，在清代政治史和上海城市史方面的開拓性貢獻，已詳見於時賢的論述。然自今日觀之，因作者對歷史語境的重視輕重有別，該書有所見亦有所蔽。



梁元生著，陳同譯：《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繫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道」雖是清代地方行政中的一級，但有意思的是，當時的人雖有省籍、府籍、州籍、縣籍，甚至鄉里籍，唯獨未聞某人氏有道籍的習俗^①。如蘇松太道，下轄蘇州府、

松江府和太倉州，這二府一州的居民，便未聞有「蘇松太」道人士的習俗。無怪乎晚清的時論認為「道員自兼營海防關權外，似可裁汰」^②。這可能也是道在清代地方行政中的作用長期被學者忽視的原因。

梁元生先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繫人物，1843-1890》（*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90*，以下簡稱《上海道台》，引用只註頁碼）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其在清代政治史和上海城市史方面的開拓性貢獻，已詳見於時賢的論述^③。然自今日觀之，因作者對歷史語境的重視輕重有別，該書有所見亦有所蔽。

一 傳統與現代模糊羈雜的聯繫

蘇松太道自雍正九年（1731）將道署移駐上海後，又稱「上海道」（頁19）。開埠以後，上海的地位日益重要，到1860年更勃興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 and 最重要的通商口

岸」(頁82)。上海道的主要經歷亦以道署駐地為主，書中拈出「上海經驗」(頁77)一詞，頗有所見。

中國的近代化^④，是由通商口岸向周邊和內地傳播的。作為「近代化的中心」(頁81)，晚清上海是歐風美雨的總匯之所。傳統社會也最突出地在這裏呈現出華界與洋界、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等多個世界。作為最高品階的駐守官員，上海道自然首當其衝地成為這裏多個世界的中間人和聯繫人，「上海經驗」即由此而生。

《上海道台》頗為精彩的地方正是對上海道所聯繫的兩個(或多個)世界的闡述，在作者看來，傳統與現代之界是模糊羸雜的。譬如，「中國最大的近代化項目」江南製造局的內部管理，「自從製造局開創後，管理人員間的爭鬥就十分普遍」(頁90、89)，而紛爭各方在很大程度上無疑均是因傳統社會裏的鄉誼而結合，如「僱傭工長和工人，總辦通常使用自己省份的人」(頁88)。與此同時，被聯繫的另一端的傳統

人物也正在發生「轉換」，父輩尚可歸入詩書禮義一類，而子孫輩的身份則「混雜」了，他們與現代內容走得更近，或者就是其中的鉅子，如聶緝槩、聶其杰父子的「轉換」(頁148)。

傳統與現代模糊羸雜的聯繫，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裏雖不罕見，但聯繫上海道居處的政治環境，其意義就極為突出。這正是作者對當日歷史語境的深刻把握之處，成為《上海道台》最精彩的地方。管理江南製造局雖是「上海道台職責中的一部分」(頁87)，即充任總辦，但「製造局的主要政策由在直隸的李鴻章和兩江總督來制訂」，後來江蘇巡撫也插手其中，「決策過程進一步複雜化」，上海道只是這些政策「主要的執行者」(頁88)。在總督、巡撫和道台疊架組成的製造局領導層中，上海道的權力難免有些逼仄。

此外，開埠早期，上海的外交(夷務)、防務、財政(海關)、民政等諸多事權，均歸屬道台(頁20-21)。1860年代以後，伴隨着自強

《上海道台》頗為精彩的地方正是對上海道所聯繫的兩個(或多個)世界的闡述，在作者看來，傳統與現代之界是模糊羸雜的。這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裏雖不罕見，但聯繫上海道居處的政治環境，其意義就極為突出。



江南製造局

上海道的雙重身份，在於他們同時充當了「兩個相互衝突的角色」，一面是近代化項目的實行者，一面又有守護社會穩定之責，他們直接目睹體用理論所遇到的實際困難。

運動，清政府對道台系統做出了調整，「道台的權力受到了總理衙門和高層政治、外交的多方面制約」（頁72），有時甚至降到了「一般工作人員的地步」（頁73）。

與此同時，上海道在「轉換」的傳統裏的處境亦與上述情況相似。近代上海勃興時，清政府對其行政等級的調整「並沒有相應跟上」。這種經濟狀況和行政狀況的相互背離，「增強了非官方的勢力」：一方面，駐守的道台始終只是正四品的中層官員；另一方面，駐守地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巨埠，當地的紳商名流可與高層建立盤根錯節的聯繫，或直接以「捐納獲得候補道台的官銜」（頁113）。仍以近代化項目為例，作者在另書中列舉了當日上海大量負責上述項目的「局」，並指出「局中最重要的辦事人員，稱為『總辦』，在清末多以候補道員（或簡稱候補道）或候補府為之」^⑤。在這些「局」的候補道員或候補知府中，自不乏本城紳商名流，他們的身份像聶氏父子一樣發生「轉換」而浸尋模糊，其權勢卻炙手可熱。

與這些變化相對應，上海道忌憚的內容浸多，難免短氣。這正是當日上海政治權力結構的主要特徵。作者指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各社會集團之間的關係就成了地方政治的決定性問題。」（頁126）傳統社會的地方行政，原本就有賴於官府與地方士紳之間的權力平衡，對前者而言，後者是一個「壓力集團」（頁111）。這種於古有徵的現象，無疑以晚清上海為最著。上海道的居處環境，也視前代官員的處境而更顯逼仄。

對歷史語境的闡釋，轉過來又豐富了上海道身份的雙重性。上海道的雙重身份，在於他們同時充當了「兩個相互衝突的角色」（頁93），一面是近代化項目的實行者，一面又有守護社會穩定之責，因此上海道是近代中國較早直面「近代化造成的社會和行政管理上的問題」的人物，「直接目睹體用理論所遇到的實際困難」（頁96），亦即「中體西用」實踐之寒暖；上海道是「春江水暖鴨先知」。

在此歷史背景下，1860年以後的上海道延綿着一個「對於傳統的重新評價和重新確認」的運動，以守護「中體」。丁日昌、應寶時、涂宗瀛、沈秉成、邵友濂和龔照瑗這些上海道都將部分精力用於創辦地方書院和促進孝順、忠義等傳統道德上（頁141-44），劉瑞芬和馮俊光更是篤信儒家道德（頁92）。因同時負有實行近代化之責，他們亦努力為「西用」在「中體」範圍內開闢進身之階，「傳統與現代性、道德與利益不再被看作是對立的兩端」（頁143）。但當「屬於『用』的範疇的工業化和交通、軍事近代化引發了一系列的變化，而這些變革已影響到了社會的道德規範這個『體』時」（頁96），他們的大多數便「不是近代化的積極實踐者和改革的熱情擁護者」（頁90）。

這是一個弔詭的現象：最近代化的城市的管理者與近代化走得若即若離。比如，沈秉成反對建立輪船公司，「因為輪船〔公司〕將剝奪中國傳統船業工人的工作，使他們失去維持生活的手段」（頁94）。這些傳統的船業工人，正是四民社會的民本。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時抗

拒近代化的上海道是據有具體情理的；但如果說近代中國被捲入發源於西方的那個過程是不可撻逆的，有具體情理之人的處境反倒尷尬。在政治權力結構內的逼仄處境和守護對象與延納內容難以掰扯的複雜環境中，這種尷尬是曲折隱微、難免於悠悠之口的。以此之故，上海道如能勝任當日的雙重身份，恐怕多半不是左右逢源、措置裕如，而是纏磨抵牾、左支右絀，有時甚至還要背上種種污名，真太史公所嘆「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不僅上海道身份的雙重性沛然飽滿，那段歷史的蒼涼和困頓亦被發見。

如果將目光轉到上海之外，上海道的處境也並不罕見。官至兩廣總督的張樹聲，在1884年的病危遺摺中，也有「既要延納『西體』又不能割捨『中體』的矛盾」^⑥。由彼及此，職微權輕者，應更為艱辛。這些較早直面體用矛盾的人物之間的歷史相似性，提示了「中學為體」在當日的困境。在這個層面上，《上海道台》照見了中國社會在早期近代化過程裏的步履維艱，近代中國不是走出中世紀的，而是被轟出中世紀的。從學術史的層面講，作者在1980年代發見上海道所面對的困局，並預感到「中體」已有招架不住源源而來的「西用」之勢，「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的歷史過程之說，已然是呼之欲出。

拈出「上海經驗」，是本書的一個特色。在書中，該詞通常以「上海的經歷」（頁29）、「上海模式的合作」（頁55）、「上海經驗」（頁77）等形式出現。以1860年代以後的「上海經驗」為例，除了包括書中業已闡明的

處理洋務及與西人接觸的經歷外，似更應將上海道的左支右絀納入其中，因為這正是體用理論的實踐經驗。如果將此亦納入「上海經驗」之中，則晚清上海道的「上海經驗」（雖然該詞不限於論述上海道），不僅有直接與現代聯繫的一面，而且也有根繫傳統的一面，書名「聯繫人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因之而發皇。

二 歷史語境與解蔽

正如上述《上海道台》的精彩部分是源於對歷史語境的深刻把握一樣，需要解蔽的部分則是其對歷史語境的不夠重視之處。

從上海開埠到1860年代以前，上海道在對外事務中有充分的自主性，即「個人外交與地方的自行決斷」（頁56）。在這一過程中的交涉成果，差不多全視上海道的個人因素為轉移。作者即以此思路研究了開埠早期的上海道。其實，在論述開埠早期的上海道之前，他們居處的歷史語境，是應予以充分闡釋的。筆者認為，當日的歷史語境至少有三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從職責上講，開埠早期上海道身份的雙重性也是存在的。他們一面「受命去議定貿易規章，處理這一口岸的對外事務」（頁20），一面亦有守護社會穩定之責，兩者也正是「兩個相互衝突的角色」。青浦教案便是一個著名例子，上海道咸齡即因未能勝任這一雙重身份而被革職（頁45-46）。

第二，從全國層面上講，上海道與西人折衝的全國環境如何？亦即在1860年代以前，對外事務在

《上海道台》照見了中國社會在早期近代化過程裏的步履維艱。作者發見上海道所面對的困局，並預感到「中體」已有招架不住源源而來的「西用」之勢，「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的歷史過程之說，已然是呼之欲出。

作者深知彼時之人對「外交」二字的認識原本顛覆，但對咸齡和麟桂的評論僅據事功成敗，並不兼顧歷史語境，似難耐人咀嚼。咸齡和麟桂何以會贏得「夷務專家」的聲名？這是揭示當日歷史語境的關鍵線索，似應着更多筆墨。

清政府的視野中佔何種地位？一般而言，清政府真正開始理解1840年那次南方邊陲戰事的意義，是在1860年「庚申之變」以後。陳旭麓也指出，「中國人認真對民族戰爭背後的內容做出反應，並相應形成一種社會思潮而波及各個階層，則無疑開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⑦後來的中興名臣，差不多也是在此時將目光轉移到對外事務上的^⑧。作者實際上更早提出此說，他指出中央政府「完全擺脫……頑固地堅持外國代表只能與省政府和地方官員進行外交談判」那種狀況，是在1860年代以後（頁64）。這就是說，開埠早期的上海道，不但同時充任了「兩個相互衝突的角色」，而且尚無體用輿論之辯。他們更多地只能據守傳統回應西方，在熟悉的傳統經驗裏尋找辦法，去應對傳統經驗之外的問題。如果說「只有在實現自身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才能真正抵抗一個近代化了的侵略者」^⑨，則開埠早期上海道居處的正是一個無可如何之局。

第三，從上海層面上講，1854年之前的「隔離政策」應予以充分考慮。「隔離政策」是開埠初期維護華洋分居的一系列政策的總稱，它出自開埠後的第一任上海道宮慕久，寄寓的是取法於傳統經驗的「夷夏大防」（頁44）。當日的這份初衷，並非只是出自一方的美好空想，而是確實方便華洋兩界的各自管理，並為中外共守，因為中西兩種社會文化、制度、習俗等懸隔太深，「在實行華洋分居之制的最初十年裏，華洋雙方的官員均不願看到這一體制被破壞」^⑩。作者也認為這項政策「相

對開展得比較平穩，在上海的外國人能夠接受」，但西人有「先見之明」：從各自管理中看到了一個不受清朝王法約束的便利，亦即為後人熟知的「半殖民地」現象（頁44）。如果西人的先見之明，不是已經熟知歷史過程的讀史者後見之明的依附，則進一步提示了當年上海道的棘手處境：傳統經驗之外的西人是有備而來的。

牢牢抓住上述歷史語境，書中對開埠早期道台的評述便需解蔽。自宮慕久開始的「隔離政策」，直到小刀會起義期間1854年7月8日公布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章程》，才在法理上被打破^⑪。亦即是說，宮慕久、咸齡和麟桂等開埠早期的上海道，均是在一個中外相安的「隔離政策」下與西人折衝的。「隔離政策」自有其歷史意義，無怪乎福建學政黃贊湯對宮慕久的「成功」頗是推許（頁45）。即便從法理上講，在修改章程之前，據守一方無疑是站住了具體的道理，雖然他們未必同時據有後人發現的世界歷史進程裏的道理，但這兩者似有進行區分的必要，庶幾洞見到當日的歷史邏輯。

《上海道台》對「隔離政策」的歷史語境未作深究，而判斷福建學政的認識「揭示的是一種自鳴得意的設想」（頁45），似未盡得當日情實。與歷史人物同時的言論，何以能為後人輕易駁倒，恐怕正是滯於區分上述兩種道理，歸根到底，則是對此處歷史語境的不夠重視。

同樣的論述亦出現在對咸齡和麟桂的論述上：「像咸齡和麟桂這樣的早期被認為是『夷務專家』或有『外交』經驗的官員，實際上被證明

是無能的外交官員。」(頁46)因為前者在作候補道台時「似乎並不是外交活動的積極參與者」(頁45)，任職上海道時又因青浦教案債事而落職；後者則在言論中展現了「幼稚和目光短淺」(頁47)。從引號的使用來看，作者深知彼時之人對「外交」二字的認識原本顛覆，但對咸齡和麟桂的評論僅據事功成敗，並不兼顧歷史語境，似難耐人咀嚼。書中這句判斷，反倒是前半截最值得深究——他們何以會贏得「夷務專家」的聲名？這正是揭示當日歷史語境的一條關鍵線索，似應着更多筆墨。

如果要對上述論述正本清源，部分原因應從近代化模式下書寫歷史的時代特點中找尋。這種書寫模式雖尚未功成身退，但其思路仍不外是以西方為標準檢視非西方地區，後者的掙扎往往還愚陋可笑，而歷史的可笑之處，有時正是它最值得深思之處：隔世的誤會和精神鴻溝深藏於此。作者將上海道放在「向前運動」和「向外運動」中考察(頁1、30)，正是近代化書寫模式的體現。這源於作者當日居處的歷史語境，《上海道台》的前身為作者的博士論文，完成於1980年，後略作修改；書後所列參考文獻，最近者為1985年。歷史語境是沒法超越的，我們可以討論近代化書寫模式的西化傾向，但不能脫離語境去苛求作者，相反更應看到《上海道台》在當日對時代的回應，即它的開拓性貢獻。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作者當日搜討相關文獻時遇到的實際困難，內地的資料尚不能見到(〈中文版自序〉，頁1-2)，文獻不足徵，自難深入研究對象的歷史語境。

約言之，《上海道台》成書的時代語境沒法超越，但在具體問題的討論上，卻提示了一個普遍的問題：兼顧史實和生成史實的歷史語境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於後者，隔世的精神鴻溝秘藏於此，歷史被發見或被隱去即在於是否對之詳繹深究。其中轉捩，只在幾希！

1860年代後，清政府在處理外交事務中體現了兩個變化：「第一個變化發生於制訂決策的過程裏，第二個變化產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頁63)對於「解決問題的過程」，作者特別強調「現存制度『內在變化』的一個過程」(頁66)，重點從「重新確定道台衙門的所在地，調整地方政府，重新規定職責」三方面進行闡述(頁67)。這是本書的重要部分，第九章〈結論〉談及「清政府的應變能力」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適應性」(頁153)，便根植於此。

以「重新確定道台衙門的所在地」為例，作為「中央政府主持的道台系統改組計劃的一部分」(頁69)，當時出現了道台衙門大量移駐條約口岸的現象。但書中僅敘述事件的經過和結果，具體的歷史背景幾乎付之闕如。這一點是尚需彌縫的。如果僅僅檢視一項過濾掉歷史語境的措施，恐難以判斷其舉措之間的靈活性抑或被動性。作者在後續的道台研究中提示：「道台與外官領事對等，故地方上之交涉由道台與領事官磋商解決。」^②後來的書評也注意到此點^③。「道台與外官領事對等」之說見於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1858年6月26日)簽署的中英《天津條約》^④。根據條約，在口岸與外人交涉的法定人選即是道台和知府。

《上海道台》成書的時代語境沒法超越，但在具體問題的討論上，卻提示了一個普遍的問題：兼顧史實和生成史實的歷史語境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於後者，隔世的精神鴻溝秘藏於此，歷史被發見或被隱去即在於是否對之詳繹深究。

馮煥光上任的時間，《上海道台》為1874年，《上海大辭典》是1875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據《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和相關奏章，馮氏於領旨後，完成交割，應正好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就任上海道。僅此例而言，《辭典》更為準確。

這樣，道台衙門移駐條約口岸，便可能只是履行城下之盟。

此項推測須有一個前提佐證：道台衙門移駐的口岸必須先有外國領事存在，即十九個道台衙門所在口岸均須先有領事官存在（頁68-69，「表4-a：1843-1877年的海關道」）。據《清季中外使領年表》，上述十九個道台衙門所在地均駐有領事官。《上海道台》強調的是1860年代以後的變化，則僅有汕頭、鎮江、漢口、牛莊、煙台（登州）、蒙自、宜昌等七口符合條件。參互《上海道台》上表和《清季中外使領年表》，上述七口中，牛莊、漢口和煙台（登州）均是先出現英國領事官，隨後才有品階對等的道台移駐；汕頭、鎮江和宜昌雖是同一年出現領事官和道台，但具體月份的先後應該存在（因資料限制，只能暫付闕如）；蒙自一口，清政府先置道台，法國於十餘年後才設領事^⑤。

如上所述，1860年代以後，在「重新確定道台衙門的所在地」的過程中，清政府率先調整的海關道，僅蒙自一處，另外三處為外人先設領事官，三處尚難確定時間先後。如果兼顧條約背景去考慮這些措施，上述粗略分析，雖不足以支撐清政府是被動履行城下之盟的推測，但亦難逕將其舉措歸納為「應變能力」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條約在當日佔有重要地位，一般論述多將由朝貢制度向條約制度的轉化作為研究近代中國變遷的一條重要線索。據《上海道台》的結構安排，第一部分的三、四兩章，即是從「『朝貢』到『條約』的變化過程」進行討論的（頁33），並指出變化的依據之一即為「外交壓力」（頁64）。

三 歷史的細節

最後列舉兩處史實疏誤。在1860年以後的上海道對傳統的重新評價和確認的運動中，書中提到上海道馮煥光的例子，說他「在私人生活中」，「是儒家的道德主義者」（頁92），「是一個虔誠的儒家道德的信奉者」。他「在『孝』的觀念驅使下，放棄了受人尊敬的道台職務，前往新疆伺候生病的父親。他的傷感和前往西部邊陲的長途旅程不僅使他終結了職業生涯，而且還使他失去了生命。歸途中，他患了病，在1877年回到上海不久後便去世了」（頁144）。此說的依據是《申報》，大致是不錯的，但細節不確。

據沈葆楨、吳元炳的奏章和光緒諭旨，馮煥光確實因為父親的原因而前往新疆，但真實的情況是，馮氏有三次去新疆：第一次是與胞弟「隨侍出關」，但當時還不是上海道台；第二次是在曾國藩幕府時，但當時是丁父憂，因此此行不是侍奉湯藥，而是迎柩歸里，並因「回逆倡亂，道途梗阻」中途而回；第三次則是在上海道任上，因適逢西北大捷，「伊犁業已通行」，此行目的與第二次同，並且是「賞假一年，無庸開缺」^⑥。相比《申報》，奏章和諭旨應更為可信。需要說明的是，奏章和諭旨揭示的史實，雖對《申報》有所糾正，卻沒有與作者的論述相刺謬，反倒更能說明馮煥光在《上海道台》中的形象。

《上海道台》長於統計，統計的基礎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以書名涵蓋的年份（1843-1890）而論，〈附錄1 上海道台（1730-1911）〉（頁158-59）和新近出版的《上海大辭典》（以下

簡稱《辭典》)所示任職道台分別是26和27人次中,至少有8人次在履職年份上不能重合;最突出的是《辭典》列出1869年杜文瀾署理上海道^⑩,而《上海道台》並未列此人。兩書之異,究竟孰是,難以遽然定讞。筆者亦無力一一考證,此處僅實證一例。馮煥光上任的時間,《上海道台》為1874年,《辭典》是1875年,並列出是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據《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75年1月2日〕內閣奉上諭:江蘇蘇松太道道員缺,着馮煥光補授。」^⑪前引沈、吳奏章亦持此說^⑫。馮氏於領旨後,完成交割,應正好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就任上海道。僅此例而言,新出的《辭典》更為準確。

註釋

- ① 繆全吉:〈明清道員的角色初探〉,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145。
- ② 《申報》,1878年6月28日,第1版。
- ③③ 熊月之:〈研究上海道台的力作——介紹《上海道台研究轉變中社會之連繫人物,1843-90》〉,《史林》,1999年第4期,頁95-99;此文主體部分亦收錄在熊月之、周武主編:《海外上海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67-74;吳士余:〈歷史模型的人文考量——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評介〉,《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8期,頁69-73。
- ④ 一般作現代化。關於「近代化」與「現代化」的相關論述,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3-8、33-36、490。本文為與作者原

- 書的用法保持一致,以「近代化」、「近代化書寫模式」代指「現代化」、「現代化書寫模式」,特此說明。
- ⑤ 梁元生:《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90-92、194。
- ⑥ 陳旭麓:〈論「中體西用」〉,載熊月之、周武編:《陳旭麓文集》,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91。
- ⑦⑧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載熊月之、周武編:《陳旭麓文集》,第一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248。
- ⑧ 楊國強:《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徬徨: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162-63。
- ⑩⑪ 熊月之主編,周武、吳桂龍著:《上海通史》,第五卷,〈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67;69-70。
- ⑫ 梁元生:〈清末的天津道與津海關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25期,頁123。
- ⑬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一)(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97。
- ⑭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94、100、102、103、105、106、123、224-27。
- ⑮⑯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總頁354-55。
- ⑰ 王榮華主編:《上海大辭典》,下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頁2084-85。
- ⑱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382。

張光潤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9級碩士研究生